

新加坡華人社會對英殖民地政府 廢婢政策的討論（1919-1932）

楊惟安

摘要

1819年，新加坡建埠後，成為英國重要的貿易港埠，因此帶動苦力貿易的發展。由於清朝海禁政策的施行，導致人口販子自中國南部沿海省分，拐賣或販售幼童與年輕女性至新加坡與香港的風氣非常興盛，其中以娼妓與妹仔人數最多。新加坡的妹仔主要從事家務工作，但因主家常為豐厚的利潤，將其賣至妓院從娼，或轉賣至他地，妹仔受虐等問題因此浮現。1920至1930年代，海峽殖民地政府對新加坡的妹仔體制是否為變相的奴隸制度展開討論，希望改善妹仔的處境。之後分別於1925年與1932年頒布「婦女佣工法案」和「妹仔法案」。華人社群亦開始重視此類社會問題，廢婢運動由此展開。本文利用英國官方檔案與華文報紙來檢視妹仔問題，對下述議題進行討論：華人社群對「婦女佣工法案」和「妹仔法案」的看法為何？華人社會與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妹仔的觀感有無差異？是否反映出東西文化價值觀的不同？

關鍵詞：妹仔、華文報紙、「婦女佣工法案」、「妹仔法案」、廢婢運動

The Chinese Community Discussions 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Abolition of Mui Tsai System in Singapore, 1919-1932

Wei-an Yang*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ort of Singapore in 1819, the British administrators regarded this place as an important commercial center. Many Chinese laborers thus came to Singapore through the coolie trade. Due to the Qing government's closed-door policy, human traffickers abducted or purchased children and young women from southern provinces in China and sold them to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ost of those females were sold as prostitutes and mui tsais (young maids). The mui tsais mainly worked as domestic servants, but their owners often resold them to brothels or to other places. This often led to ill treatments of the mui tsais.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governments of Straits Settlements began to discuss the links between the mui tsai system and slavery, hoping to improve mui tsais' living condition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Female Domestic Servants Bill and Mui Tsai Ordinance were enacted in 1925 and 1932, respectively, as a way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mui tsai problem.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lso became concerned with this social problem,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Mui Tsai Movement. In this study, the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and Chinese newspaper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Singapore, and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explored: What were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garding Female Domestic Servants Bill and Mui Tsai Ordinance? Di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mui tsais question hel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flect different values in eastern and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western cultures?

Keywords: mui tsais, Chinese newspapers, Female Domestic Servants Bill, Mui Tsai Ordinance, Anti-Mui Tsai Movement

新加坡華人社會對英殖民地政府 廢婢政策的討論（1919-1932）*

楊惟安**

壹、前言

英屬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於1826年將馬來半島的新加坡、檳城，及馬六甲，合組成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採行自由貿易政策，在中國通商口岸展開招募勞工的工作。此時清政府允許外國商人於寧波、泉州、廣州等地從事通商貿易，但禁止婦女出洋，促成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走私婦孺貿易的興盛。這些被拐賣或販售至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幼女或少女，主要從事娼妓、妹仔（mui tsais）¹或僕役等工作。

關於新加坡妹仔議題的研究，近年來主要採用英國殖民部檔案及Sir Wilfrid Woods和Edith Picton Turbervill彙編的《委員會報告書：香港與馬來西亞地區的妹仔》（*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 本文初稿原以〈從華文報紙探究新加坡的廢婢運動（1919-1932）〉為題，發表於2018年11月9-10日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第14屆文化交流史：城市、貿易與交通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會上評論人衣若蘭教授及與會學者惠賜珍貴意見，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卓見指正，受教良多，特在此一併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19年6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8月7日。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¹ 妹仔為廣東方言，也稱為住年妹、住年女或住年婢。妹仔體制的源起為許多貧困家庭將幼女賣到他人家庭從事勞役工作，以解決家中的經濟問題。參見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76。

英國殖民部檔案有CO 273 Colonial Office: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al Correspondence、CO 274 Colonial Office: Straits Settlements Acts、CO 323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及CO 825 Colonial Office: Eastern Original Correspondence，收錄婦孺販賣貿易、妹仔管制辦法、擬定妹仔法令的討論及妹仔委員會等文獻資料。*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為官方報告書，收錄妹仔委員會（Mui Tsai Commission）於1936年調查香港與英屬馬來亞妹仔情況的資料，之後將調查報告內容彙整為多數派報告（The Majority Report）與少數派報告（The Minority Report），作為日後擬定新的妹仔法令的參考資料。²

英文著作側重於討論妹仔體制形成的緣由、妹仔非法買賣問題、妹仔受虐問題及英國殖民部的因應措施。Rachel Leow在《關於廢除英屬馬來亞的妹仔爭論，1878-1938年》（*Contexts of Abolition: the mui tsai controversy in British Malaya, 1878-1938*）一書中檢視海峽殖民地政府無法解決英屬馬來亞的妹仔問題之因，認為與中國的社會情況有著密切關聯。Leow指出中國南部省分的貧困家庭常將幼女賣給他人，以舒緩經濟壓力，被視為是替代中國殺嬰習俗較為仁慈的選擇；而購買妹仔者則可以取得勞動力，因此對買賣雙方皆為有利的交易。然而，對英國殖民政府來說，販賣人口作為僕役之用途與奴隸貿易無異，應予以取締。由於華人社群與官方政府在管理妹仔方案上，一直無法取得共識，因此成為廢婢政策執行成效不佳的主因。³

Leow的另一篇文章〈是否蓄養非華裔妹仔？重新檢視馬來亞與香港的種族與婦女僕役議題，1919-1939年〉（‘Do you Own Non-Chinese Mui tsai?’ Reexamining Race and Female Servitude in Malaya and Hong Kong, 1919-1939），及Karen Yuen的〈華人議題理論化的討論：香港與英屬馬來亞對妹仔之爭論與跨境中國性〉（*Theorizing the Chinese: The Mui Tsai Controversy and Constrictions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and British Malaya*）皆

²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37).

³ Rachel Leow, *Contexts of Abolition: the Mui Tsai Controversy in British Malaya, 1878-1938*.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p. 2.

論述英國殖民政府難以對妹仔群體的身分進行辨別，因此在處理妹仔受虐案件時，將其歸為華人社群特有的社會問題。前者從馬來亞地區與香港殖民政府和華人社群對妹仔身分的討論，反映出東西方價值觀的差異，因此管理方案亦有所不同；後者檢視香港與英屬馬來亞的華人風俗與妹仔群體之間的關聯，從而探究英國殖民政府與華人社群對妹仔問題的爭議之處。⁴

Claire Lowrie的〈販賣與竊取：1920至1930年代達爾文港與新加坡的家庭「僕役」與對「保護」修辭之討論〉（Sold and stolen: domestic 'slaves' and the rhetoric of 'protection' in Darwin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檢視新加坡華人家庭與達爾文港的歐洲人家庭使用未成年女僕的問題，並指出這些女孩多為主家自人口販子手中購得。新加坡與達爾文港政府依照當地社群組成與社會環境，來擬訂對僕役的管理辦法。⁵ Lowrie的另一篇文章〈雇主與移居殖民地者：1920至1930年代華人僕役的管理策略〉（Masters and coloniser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domestic mastery, 1920s-1930s），探究新加坡與達爾文港的華人家庭僱用僕役的情況。她指出新加坡政府秉持多數華人雇主是友善與道德崇高的看法，不會毫無理由的虐待妹仔，因此對此群體的管理較為寬鬆；相對的，達爾文港的華人家庭虐待原住民僕役的案例較多，因此當地政府對犯法主家採嚴格責罰的政策。從這兩地管理華人家庭使用僕役的方案，反映出殖民政府會視當地族群的組成，採取不同的管理政策。⁶ 上述的論文較少提及華人社群對妹仔議題的觀感，及討論英國殖民政府與華人社群對妹仔法案的不同看法。

⁴ Rachel Leow, “‘Do you Own Non-Chinese Mui tsai?’ Reexamining Race and Female Servitude in Malaya and Hong Kong, 1919-1939”, *Modern Asian Studies*, 46:6 (November 2012), pp. 1736-1763; Karen Yuen, “Theorizing the Chinese: The Mui Tsai Controversy and Constrictions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and British Malaya”,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December 2004), pp. 95-110.

⁵ Claire Lowrie, “Sold and Stolen: Domestic 'Slaves' and the Rhetoric of 'Protection' in Darwin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in A. Vickers & M. Hanlon eds., *Asia Reconstructed: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AA* (Canberr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6), pp. 1-16.

⁶ Claire Lowrie, “Masters and Coloniser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Domestic Mastery, 1920s-1930s,” in Claire Lowrie, *Masters and Servants: Cultures of Empire in the Trop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54-181.

中文著作對妹仔議題側重於討論香港與新加坡妹仔體制的共同點與差異處。可兒弘明的《「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探究香港與新加坡娼妓制度與妹仔體制的淵源與發展、保良局（Po Leung Kuk）的作用，及豬花貿易的運作模式。⁷該書採用資料為香港保良局的文獻，因此對新加坡妹仔的議題討論較少。李雯的〈身似斷雲零落—20世紀初期新加坡的妹仔〉採用英國殖民部檔案、國際聯盟文獻及口述歷史等資料，從性別史與社會史視角來探討新加坡妹仔群體的源起及其產生的社會問題，並從中檢視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妹仔貿易網絡運作模式。⁸

上述著作主要是從英國政府的視角探究妹仔的相關議題，但關於華人社群對妹仔體制的觀感，及對英國廢婢運動的回應等議題則很少觸及。本文將以華文報紙來檢視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的妹仔議題，此因過往學界較少以報紙作為主要史料，來討論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的婦女問題。⁹19世紀末，華人開始在新加坡定居下來，第一份華文報紙《叻報》亦於1881年創刊，之後《天南新報》、《南洋總匯新報》、《中興日報》等相繼創刊。華報扮演著向華人社群傳遞英國官方訊息的重要角色，且為新客華人（China-born Chinese）與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僑領及知識分子討論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議題的園地。¹⁰

辛亥革命後，新加坡的辦報者重新調整辦報方針，逐步轉向商業化的性質

⁷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

⁸ 李雯，〈身似斷雲零落—20世紀初期新加坡的妹仔〉，《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1期（2011年3月），頁47-55。

⁹ 學界較少以華文報紙作為主要史料，應與華文報紙的發行之量及讀者群有關。新加坡淪陷前，訂報者主要為商家與華社，較少華人家庭訂報，因此難以形成穩固的讀者群。舉例來說，《南洋商報》創刊號約印3,000份，日後日銷平均量為2,200份，《新國民日報》平均日銷量則約3,000份。參見王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新加坡：新加坡新社，1987年），頁51。

¹⁰ 華人社會占新加坡總人口數的八成，分成新客華人與海峽華人兩個群體。前者不認同新加坡為其母國，對海峽殖民地政府頒布的法規或政策較不願意配合；後者為海峽華人，多數人接受英語教育及擔任政府公職。參見李元瑾，〈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意識的轉變〉，收入李元瑾主編，《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2年），頁61-65。

發展，並開始關注新加坡的社會議題。¹¹ 至1920年代，《新國民日報》¹²、《南洋商報》¹³與《星洲日報》¹⁴相繼創刊。受到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影響，華報轉載更多來自中國及南洋地區的婦女運動、廢婢運動及娼妓問題等文章。華人社群亦以報紙為平台，討論各個階層華人女性的教育、社會、經濟、家庭等問題。因此，本文將分成兩個階段來探討新加坡廢婢運動的發展：1919年至1925年「婦女佣工法案」的頒布，及1926年至1932年「妹仔法案」的施行，以了解英國殖民部政府在不同時期對妹仔體制的處理態度，及華人社群對蓄婢制的關切議題。

貳、妹仔體制之源起

妹仔體制的盛行與近代中國的農村家庭型態有著密切的關聯，即以男性為中心的父系家長制，當迫於天災、戰爭，面臨饑荒或生活貧困時，父母做出典當、販賣子女的行為，普遍較能取得人們的諒解。在此背景下，許多貧困人家將女兒賣到生活環境較佳的家庭做婢女，而主家購買妹仔的主要目的則為獲得勞動力。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戰爭嚴重破壞南部省分的經濟體制，成為人口販賣猖獗之主因。許多人口販子到中國沿海鄉村，以南洋地區在招募理髮師、裁縫師與女傭為名義，用高薪利誘年輕女性，將她們拐賣至澳門、香港、新加坡等地。抵達目

¹¹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傳播系，1996年），頁1-2。

¹² 1919年，謝文進等人將《國民報》改版為《新國民日報》，為中國國民黨的喉舌報，該報創辦各種類型的副刊，討論政治、社經活動、婦女問題等議題。參見王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頁21、23。

¹³ 陳嘉庚為企業家，經營新利川黃梨廠與樹膠製品廠，並於廈門先後創辦集美小學與廈門大學。他於1923年9月6日創辦《南洋商報》，目的是要利用該報刊登宣傳與銷售樹膠業產品。他在創刊號中特別指出《南洋商報》的「商」的涵義為唯有教育與實業發達，才能興家興國；若沒有現代化的商業經營與管理的知識，就無法辦好教育，沒有良好的教育，國家也就無法興旺。參見邱新民，《新加坡先驅人物》（新加坡：勝友書局，1991年），頁248-249；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47、49。

¹⁴ 1929年1月15日，胡文虎與胡文豹創辦《星洲日報》，目的在利用報紙來銷售其公司產品，並希望藉由該報來推動當地的華文教育。在創刊號中，特別強調辦報宗旨在為華人說話，為華人服務，從而達到傳遞中華文化的目標。參考彭偉步，《《星洲日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7。

的地後，人口販子再將這些女子轉賣給當地華人做侍妾、娼妓、養女和婢女。¹⁵

造成此時期販賣婦孺貿易興盛的另一因素為「中英續增條約」於1860年的頒布。該條約允許華民出洋承工，根據「中英續增條約」第五款規定：

一、戊午年定約互換以後，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英欽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¹⁶

此項新招工條款頒訂後，中國人民必須依據合約才能出洋，及攜帶家眷同行。但單身女子出洋仍受到政府管制，只能透過兩種途徑下南洋：與家人同行，或透過販賣人口的途徑。前者多數是跟隨丈夫或親戚到南洋地區工作的婦女，但過了數年就會返回中國，僅有少數人選擇定居當地；後者則多數為出身貧困的女性，從事娼妓或妹仔的工作。¹⁷

鑒於中國南部沿海省分的非法人口販賣貿易日漸猖獗，清廷亦加重對人口販子的刑罰。從下述兩段文獻可知當時的情況：

漳、泉一帶每有匪棍客頭，分布夥黨，設計拐騙愚民及年幼子女，販售出洋，殘虐荼毒，貽害實非淺鮮。前經刑部奏定新章，內地奸民設計誘騙愚民出洋承工，其人並非甘願，因被拐賣威，致父子兄弟離散者，不論所拐係男婦子女及良民奴婢，已賣未賣，曾否上船出洋，但係誘拐已成，為首斬立決，為從絞立決。¹⁸

又律載，誘拐婦人子女，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被誘之人若不知情，為首擬監絞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若以藥餅迷拐小子女，

¹⁵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27。

¹⁶ 黃月波、于能模、鮑鵬人編，《中外條約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頁12。

¹⁷ Ah Eng Lai, *Peasants, Proletarians and Prostitut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ork of Chinese Women in Colonial Malay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16.

¹⁸ 〈閩浙總督李鶴年為漳泉一帶拐人出洋承工擬責成地方官嚴密緝查並研定功過致總督咨文〉（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收入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0。

為首者絞，為從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各等語。¹⁹

由文獻內容可知，清廷實施嚴峻的法令來管制非法販賣婦孺的活動，但總理衙門調查追回遭販賣婦孺的情況，表示遭販賣者若已出洋，則難追蹤其行蹤。上述情況應與妹仔交易形式有關，進行妹仔買賣時，要有見證人和仲介者在場，買家會根據女孩的身家情況與賣家洽談價格。若是雙方同意，買家先付給賣家訂金，之後再付清身價銀及取得賣身文書，人身轉讓手續由此正式完成。²⁰ 然而，有許多家庭會將妹仔轉賣給人口販子，以賺取更多的金錢。進行交易時，賣家將賣身文契交給新主家時，要附上妹仔先前的老契，從而確定新主家的繼承權。²¹ 此外，有些妹仔主人碰到債務問題時，會將她們作為抵押品轉讓給他人，其中有許多女孩因此被販賣至海外地區。

在新加坡，許多華人家庭購買妹仔作為家中僕役之用，主要從事無償的勞動活動，如煮飯、清掃房屋等家務工作來換取食宿。妹仔成人後，有些人嫁給雇主兒子或成為雇主的妾，或被轉賣至其他家庭。但有些雇主的身分為妓院老闆，以蓄養妹仔的名義購買女孩，待其成年後就逼其為娼。上述案件於19世紀末之後頻繁發生。如前所述，英國將新加坡作為自由貿易港埠，許多華商因此前來從事商業貿易。但多數人抱持暫時僑居的心態，並未計劃長期居住在新加坡，因此他們以故鄉方言交談，加入當地的宗會組織，及保持家鄉的生活方式，如納妾、嫖妓及購買婢女等。至1880年代，新加坡逐漸從移民社會轉型成為定居社會，華人社群開始建立私塾、書院、學校等教育機構，並開始發行華文報紙。²² 初期，華報多轉載中國的新聞報導與文章，較少報導當地的華人婦女的問題。其中，《叻報》有幾篇報導提及中國與新加坡販賣婦孺活動，如一則新聞報導廣東育嬰堂常

¹⁹ 〈刑部咨總理衙門請如毛鴻賓所奏將掠賣人口罪犯處斬文〉（同治三年十月初五日），收入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1輯，頁51。

²⁰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27。

²¹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295-296。

²² 隨著新加坡華人人口的增加，及華校的相繼建立，開始有中國知識分子南來創辦報紙，但其政治立場多傾向孫中山的革命派，或梁啟超與康有為的保皇派。前者代表性報紙有《中興日報》、《圖南日報》，後者則有《天南新報》、《南洋總匯新報》等。參見吳慶棠，《新加坡華文報業與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頁27、109；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25-29。

發生人們以領養幼女為名義，實際上讓她們從事婢女的工作，甚至將其轉售至新加坡的妓院。甚者，有婦女守候於育嬰堂附近，當看到人們抱著女嬰前來就直接將其攔下，表達想收養之意，卻將其轉賣至妓院。²³但這些報導並未對案件進行追蹤，因此無法得知受害者此後的遭遇。

實際上，「婦女佣工法案」頒布前，妹仔的新聞報導主要以中國、香港等地的廢婢運動與虐待婢女為主，此因二地的廢婢運動最早展開，相關討論也較多。1909（宣統元年）12月，清政府正式下令禁止買賣人口，並規定所有的奴婢都改稱為雇工，且要給予薪資。²⁴但此新法例成效不彰，廣東與廣西兩省的海外非法人口販賣依然猖獗，直至民國成立後，情況仍未有所改善。1922年，廣州軍政府孫中山大總統再次下令嚴禁蓄婢，若有違反者一律嚴懲：

所有專制時代之階級制度，早經完全廢除，乃查私家蓄婢，至今未已。甚至買賣典當，視同物品，賤視虐待，不如牛馬。既乖人道，尤犯刑章。茲特明令嚴行禁止，嗣後如再有買賣者，為婢及蓄者，一經發覺，立即依法治罪。²⁵

新法令頒布後，內務部通知各省訂定貧女教育辦法。國民政府成立後，廈門、汕頭等沿海城市相繼展開廢婢運動。²⁶同一時期，香港政府於1921年8月組織禁止蓄婢會，及1922年3月成立反對蓄婢會（Anti-Mui Tsai Society），致力於推動廢婢運動。²⁷香港立法議會於1923年頒布「婦女家政服務法令」（Female Domestic Service Bill），規定所有蓄養妹仔的主家都必須向政府進行註冊登記，且定時會派人員視察妹仔的生活環境。新法令旨在保護妹仔，及授予香港殖民地政府監管

²³ 《叻報》，新加坡，1893年1月12日。其他相關報導有〈論私娼宜亟為查禁〉，《叻報》，1890年3月15日；〈十八日早堂公案〉，《叻報》，1900年1月18日；〈失女報案〉，《叻報》，1900年1月15日。按：以上取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網站電子版，皆未標示版次。

²⁴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308。

²⁵ 〈嚴禁蓄婢之大總統明令〉，《新國民日報》，新加坡，1922年3月10日，版3。

²⁶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307。

²⁷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pp. 159-160.

此群體的權力。²⁸ 新加坡華文報紙亦轉載中國與香港廢婢運動的報導，但華人僑領並未對廢婢運動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相較於中國與香港，新加坡的廢婢運動起步較晚。此時期的妹仔新聞以虐待案件為主，如《新國民日報》的〈虐待慘聞〉（1922年3月27日）、〈虐死婢女之可惡〉（1922年6月16日）及《南洋商報》的〈虐待女婢〉（1924年4月9日）、虐待婢女被控（1924年5月28日）等。²⁹ 這些報導主要敘述妹仔受虐情況，及官方對主家的處理辦法，如《新國民日報》的排字工人於屋頂上發現一名約13歲的女孩，原本被養母用鐵鍊鎖住監禁，後來逃至該處躲藏，之後被送至保良局。此報導並未說明該女孩的真實身分是否為妹仔，但許多華人家庭會將妹仔佯裝成養女進行收養，以逃避官員的視察。另一則報導為潮人劉炳蔭虐待婢女之案。在法庭上，被告者稱其15歲婢女是請親戚購買，由於該女行為頑劣難以管

表1、《新國民日報》妹仔新聞報導統計表（1920-1932）

年份	新加坡	英屬馬來亞	中國	香港	南洋地區	其他	總數
1920	2	0	0	0	0	0	2
1921	4	1	2	2	2	1	12
1922	6	2	5	3	3	0	19
1923	1	0	0	0	0	0	1
1924	2	0	0	2	2	1	7
1925	13	0	0	0	0	3	16
1926	1	0	0	0	1	2	4
1927	3	0	8	0	0	3	14
1928	1	0	0	0	1	3	5
1929	1	0	0	1	1	5	8
1930	10	0	0	0	1	2	13
1931	9	0	0	0	0	5	14
1932	7	2	0	0	0	8	17

說明：《新國民日報》電子版收錄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網站，其中數個時期的新聞報導有缺漏，因此以能掌握的資料彙整出1920年至1932年中國、香港、英屬馬來亞及南洋地區的妹仔報導。

²⁸ Karen Yuen, “Theorizing the Chinese: The Mui Tsai Controversy and Constructions of Transitional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and British Malaya”,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p. 103.

²⁹ 參見表1《新國民日報》妹仔新聞報導統計表與表2《南洋商報》妹仔新聞報導統計表。

表2、《南洋商報》妹仔新聞報導統計表（1924-1932）

年份	新加坡	英屬馬來亞	中國	香港	南洋地區	其他	總數
1924	4	0	0	0	0	0	4
1925	6	1	0	0	0	0	7
1926	4	0	2	0	4	0	10
1927	2	0	1	0	1	1	5
1928	18	0	0	0	2	3	23
1929	21	1	7	1	2	6	38
1930	10	0	0	0	0	13	23
1931	18	1	0	5	1	4	29
1932	20	1	1	0	0	1	23

說明：《南洋商報》電子版收錄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網站，其中數個時期的新聞報導有缺漏。此外，該報於1923年11月刊載抨擊北洋軍閥曹錕賄選為總統的報導，讓陳嘉庚認為違反其辦報宗旨，而該報亦遭到英政府當局勒令停刊3個月。因此以能掌握的資料彙整出1924年至1932年中國、香港、英屬馬來亞及南洋地區的妹仔報導。

教，才對其杖責毆打。最終法官判被告繳交250元的罰款，再對受虐婢女進行安置。然而，多數妹仔受虐事件並未引起華人社會的關注，對這些案件的後續發展亦未進行追蹤報導。

此因海峽殖民地政府於1920年代初期展開廢除華人公娼運動，賣淫業問題又對華人社會影響較深，因此，無論是僑領或華人知識分子更為關切娼妓議題，對妹仔的相關討論較少。隨著中國與香港的廢婢運動開展後，當地華人認為妹仔問題亦應予以重視，於華文報紙對此社會議題亦進行討論。趙澹甫在〈廢婢問題〉中指出許多妹仔遭到非人道的對待，對其遭遇應予以重視，並強調她們多數是因為家中經濟困頓，而被販售至他家。³⁰ 沈冰心更進一步地指出蓄婢問題的嚴重性：

華僑之中，蓄婢多而蓄奴少，非已悟奴之不當蓄也，實因之婢，其在幼年時，曾經過如何如何之虐待。在成年時，曾經過如何如何之踐踏，最後又經過如何如何之轉轉出賣。箇中罪惡史，在主人能知之，在身受者

³⁰ 趙澹甫，〈廢婢問題〉，《新國民日報》，1927年7月26日，版8。

能言之，在閱者諸君能道聽途說而得之。³¹

從內容可知，妹仔問題實為多數華人社群所熟知，但仍持漠視的態度，此與華人社群性別比例嚴重不平衡有關。妹仔為華人家庭提供了勞動力的來源，待其成人後，再將其嫁給主家的兒子或成為主人的妾，主家僅需花錢購買妹仔，而無其他的開銷。且主家擁有妹仔的賣身文契，身為奴僕，幸運者被視為家人，甚至可以接受教育。但多數妹仔被主家視為一件物品，可以任意責罰或轉賣，他人也不會加以過問。

依據慣例，買家應授予其已成年的妹仔出嫁自由，然而，許多主家為取得更優渥的聘金，將她們嫁給年長許多之人，或未待其成年就抵押或轉賣給新主家。由於賣身文契上未註明買家不得任意轉賣妹仔，此漏洞也就被許多不肖主家所利用，將女孩轉賣到妓院，以謀取更高的利益。³² 由於英國殖民部並未擬訂管理妹仔的相關法令，因此蓄養妹仔的華人家庭不需要向華民護衛司（Chinese Protectorate）³³ 註冊登記。在「婦女佣工法案」頒布前，華民護衛司僅於妹仔通過新加坡海關時，查核其入埠目的及身分，之後則未追蹤其去向。

叁、「婦女佣工法案」的頒布及實施情況

19世紀末，海峽殖民地政府採取「以華制華」政策，並以「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Women and Girls Protection Ordinances）與「勞工法」（Labour Code）來管理該群體。此因英國在1833年通過「廢奴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廢除本土及其殖民地的奴隸制度。之後，英國本土先後以「主人與僕役

³¹ 沈冰心，〈請華僑速除蓄婢之惡習〉，《南洋商報》，新加坡，1926年5月13日，版2。

³²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p. 128.

³³ 1877年，海峽殖民地政府為了有效地處理華人社會中的私會黨、賭博、鴉片及賣淫業問題，因此設置華民護衛司，主要職掌為查緝非法賣淫與販賣人口貿易，及居中排解各私會黨之間的衝突事件。首任華民護衛官（Chinese Protector）為畢麒麟（William Pickering）。參見No Siew Yoong,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Singapore, 1877- 190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 (March 1961), pp. 79-80.

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與「工廠法」(Factory Acts)來規範主家與僕役的關係,並對各類型僕役的工作時間與薪資皆有詳細的規定。³⁴此外,由於這些僕役的自主性較高,可以視情況與主家中止契約關係,之後再依照國內的社會情況變化來修訂法律。在此背景下,英國殖民部將新加坡妹仔的身分歸為僕役。但實際上,「婦女佣工法案」頒布前,官方政府並未認可妹仔群體的存在,此群體是置於「勞工法」之下,以主家主人或主婦為其法定監護人。³⁵若是妹仔遭受虐待,則依據「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及其修訂法案,來懲辦藏匿21歲以下女性的人,進行購買或轉賣10歲以下幼女的交易行為,則被視為違法,將被處以監禁或罰款。³⁶受虐妹仔則送到保良局安置,英國當局認為這些措施就能確保她們的安全無虞。

至20世紀初期,海峽殖民地政府仍藉由法令與保良局的設置,來保護受虐幼女與少女,同時指派華民護衛官調查婦女受虐案件,及非法買賣婦孺的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開始處理會員國內的非法販運婦孺問題,並於1921年頒布「遏止販運婦孺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總共有33個國家簽署。³⁷此會議是由國際聯盟設置的遏止販運婦孺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Suppression of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IBSTWC)主辦,旨在透過國際之間的合作共同打擊人口販賣貿易,組織名稱亦由原本的「白人奴隸貿易」改為「販運婦孺」,強調受害者不會因其種族與族群,而遭到漠視。³⁸該機構的成立對取締販賣婦孺活動帶來

³⁴ Selina Todd, "Domestic Servi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Britain 1900-1950", *Past & Present*, 203 (May 2009), p. 196.

³⁵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p. 190.

³⁶ 〈議政局會議紀(三)〉,《南洋商報》,1925年8月26日,版3。

³⁷ 19世紀初,英國已展開基督教傳道工作、慈善事務,及反奴運動,在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Henri Dunant的努力下,促成1864年日內瓦會議的召開。1898年,國際紅十字會成立國際組織來取締販賣人口貿易。之後,道德與社會衛生協會(Association for Moral & Social Hygiene)及反對傳染性疾病國家議會(National Council for Combating Venereal Disease)相繼成立,致力於廢娼運動的推動。參見Stephanie A. Limoncelli, *The Politics of Trafficking: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 Combat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Wom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

³⁸ Kevin Grant, Philippa Levine, and Frank Trentmann, eds., *Beyond Sovereignty: Britain, Empire*

兩項重要改變：第一、其運動性質從各國內部問題提升至國際議題；第二、原本各國將販賣婦孺活動視為受害者自身所致，如今轉而將罪責歸咎於操控販賣婦孺貿易的人口販子。³⁹ 作為遏止販運婦孺國際協會的會員國，英國成立一個中央辦公室來追蹤與報告本地的販賣婦孺貿易情況，及定期遞交年度報告，並在其亞洲殖民地展開廢除公娼制度與廢婢運動。

隨著香港廢婢運動的展開，海峽殖民地政府也開始推動管理妹仔群體的辦法。根據官方的統計，1922年約有7千名妹仔，平均每個月有60至70名妹仔來到新加坡。⁴⁰ 這些移民者抵埠後，經華民護衛司的官員審查是否有可疑人士攜帶幼女或少女入境。入境者向海關人員出示其證件，說明是當地華人家庭聘僱來從事家事工作，就能順利通關。若是發現可疑者，會更進一步地詢問移民者的身分、年齡與來埠目的，及觀察隨行孩童或少女的外表，並對兩者的關係進行盤查。但多數人口販子事先已教導她們如何回答官員的問題，並對負責人員自稱是女孩的親屬或養母。僅有少數特殊案例會被海關人員察覺，進而對人口販子進行拘留，其他妹仔入境後，就被送至購買她們的華人家庭，從事僕役工作。

妹仔受虐案件發生時，雖然交由華民護衛司負責處理，但如前述華文報導所述，多數妹仔受虐案件通常是以證據不足或受害者證詞有誤而結案，被告則判處罰款或監禁，或當庭無罪釋放。再者，由於妹仔不用向政府進行登記註冊，因此無法掌握其去向，且許多人常被轉賣至新的主家或其他地區，唯有遭到舉報虐待幼童或在妓院查獲非法販賣的孩童，外界才得以了解妹仔處境。在此情勢下，英國殖民地部遂擬訂「婦女傭工法案」來進一步地處理妹仔問題。

1925年8月24日，立法委員會通過「婦女傭工法案」，並於隔年1月1日正式施行。新法令旨在管制與保護海峽殖民地境內的婦女僕役。官方為了維繫與華人社群的關係，數次強調頒布條例的目的並非要干涉其養女風俗，而是要禁止華人

and Transnationalism, c. 1880-19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57.

³⁹ Daniel Gorman, "Empire,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1920s",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9:2 (2008), pp.198-200.

⁴⁰ Ah Eng Lai, *Peasants, Proletarians and Prostitut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ork of Chinese Women in Colonial Malaya*, p. 46.

家庭以認養養女的名義購買幼女作為婢女之行為。⁴¹ 該法令第五項「保護者」中規定：

（一）應詢問被僱女性之父母、（二）須繳交相片、（三）須繳納保證金以保證婦女能得到所需之保護，且可離開本殖民地，又不能以非法方式僱為女僕，也不得在未得到保護者允許前，擅自遷移他處。⁴²

新法令的特色為授予華民護衛司監管妹仔活動的權力，若是對10歲以下的幼女從事僕役工作內容有所疑慮，可以要求雇主提供妹仔的照片，以確認她們並非雛妓。新法令也加重對雇主的刑罰，若透過非法途徑購買婢女或未替其進行註冊登記，將處以最高六個月監禁及最高200元的罰款。此外，雇主必須付給18歲以下的妹仔薪資，及提供她們衣物、糧食與醫療等，日後的新妹仔則以僕役身分聘用。⁴³ 若發生妹仔虐待事件，主家則將被處以500元以下罰款或兩年以下徒刑，或兩者兼之。被送至保良局或庇護所安置的少女或幼女，有權利決定是否要離開新加坡。法令亦規定若是婦人或少女被人帶到政府所指定之目的地，其原本雇主或保護者必須讓她們離開，並授予其至他地的所需執照，以防止出現重返主家工作，或因找不到出路而淪為私娼等情況的發生。⁴⁴

「婦女佣工法案」頒布後，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外地華人婦女前來新加坡的管制更加嚴格。華報報導轉載華民政務司的諭令，提醒人們行經新加坡或來到此地旅遊時，需要特別注意下列情況：

三州府華民政務司，為警告婦女提防拐賣事。汝等如過埠或旅行，遇有不相識之男女向汝講話，或向汝慫恿招待，切勿聽其言語，因現有立心歹惡之男女甚多，專以誘拐或棍騙少年婦女，賣作娼妓，或逼作其他不端之事為業，凡汝婦女，倘被此等拐圖誘入其牢籠者，宜即倩人報知最

⁴¹ 〈業經通過三讀會之取締婢女條例〉，《叻報》，1925年10月28日，版3。

⁴² “Ordinance No. 24 of 1925, An Ordinance to Amend Ordinance No. 143” (Women and Girls Protec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274/18, p. 1.

⁴³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pp. 194-195.

⁴⁴ 〈海峽殖民地將公布取締虐待女僕及婢女之新條例〉，《南洋商報》，1925年7月20日，版3。

近之巡捕房……。⁴⁵

由上述內容可知，即使「婦女佣工法案」與「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修訂法案的相繼公布，仍無法有效地杜絕非法販賣婦孺貿易的發生。如同此篇報導所提，人口販子常偽裝成熱心民眾協助旅人，但其真正目的為拐騙婦女，將其販售至妓院或賣給華人家庭當婢女。

由於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妹仔問題的逐漸重視，華報對此群體的新聞也開始增加，對妹仔受虐案件與販賣婦孺的內容亦更為詳盡。與「婦女佣工法案」頒布前的情況不同，華文報紙對妹仔的受虐原因、主家罪行、法庭審訊及其判決內容皆詳細地記載。前種類型的報導，以《南洋商報》報導的李亞福虐待婢女案為例，受害者陳麗卿年僅14歲，因遭到主人李亞福毒打而親自向華民護衛司報案，但在法庭上，控告者的供詞卻前後矛盾，最後法院因證據不足，將其雇主無罪釋放。⁴⁶另一案例為楊大妹虐待兩名婢女案，《新國民日報》與《南洋商報》皆對此案進行追蹤報導。海峽華人楊大妹遭指控虐待妹仔翠香與陳香情，常對她們施以杖責。⁴⁷翠香向警長梅氏說明曾與被告共住三年，雇主告知其身分為女僕，但並未依法給付她們薪資，僅在生日或特殊節日不定時給予零用金3或4元。且之前腳傷因為過度工作才被帶去醫治，其他小傷未曾進行診治。另一妹仔陳香情亦控訴雇主常不准她們用餐，且曾以沸水沖洗其雙腳，並不時毒打她們。楊大妹因罪證確鑿而被判有罪，遭罰100元，兩名妹仔則被送到保良局進行安置。⁴⁸

後者類型的報導則常與華人賣淫業有所關聯，以〈護司重申警告婦女之示諭〉為例，案由為華民護衛司控告當地已逝建築包工蘇媽英之妻吳錦娘逼迫養女從娼，受害者蘇碧金年約16歲，因為不願從娼而遭到養母施虐，且已感染性病。原告為蘇碧金之兄蘇振華，指稱被告已有三名養女非法賣淫，吳錦娘則辯稱其夫生前讓養女接受教育，且遺囑載明其出嫁時可得1千元來置辦嫁妝，因此

⁴⁵ 〈護司重申警告婦女之示諭〉，《南洋商報》，1928年9月18日，版4。

⁴⁶ 〈打喇士街李亞福虐待女婢案·遍體鱗傷醫生證明〉，《南洋商報》，1931年7月8日，版6。

⁴⁷ 〈寄養少女遭殘暴·楊大妹被控虐待·十齡少女作苦工·藤鞭口咬一齊施·罰一百元·人財兩空〉，《南洋商報》，1931年7月25日，版7。

⁴⁸ 〈楊大妹虐待少女·法官判有罪〉，《南洋商報》，1931年7月27日，版8。

並無逼迫蘇碧金從娼之事。由於原告無法提出有力的人證與物證，此案以毆傷養女罪名，輕罰被告10元結案，蘇碧金則被送到保良局安置。⁴⁹另一則報導為〈逼良為娼之拐婆〉，講述華民護衛司查獲閩籍婦人陳美嫂拐賣少女陳寶珠來埠之案件。受害者原籍廈門，因家中經濟陷入困頓，向陳美嫂借款數百元後無力償還，遂將其作為抵押品。之後，被告以讓陳寶珠接受教育為誘騙藉口，先將其帶往仰光，欲將女孩販售到當地的人肉市場，但立即被對方識破其計畫，遂改將她帶到新加坡。抵埠後，陳美嫂欲故技重施，逼迫少女賣淫，並毆打對方讓其就範。由於陳寶珠久未與家人聯絡，後者遂委託本埠親戚查詢其行蹤，進而揭露此次受虐事件，並通報華民護衛司將陳美嫂予以拘捕。此案件送審後，原告最終遭判罰款250元與三個月苦監，陳寶珠則暫送至保良局安置。⁵⁰

無論是妹仔受虐案件或逼迫妹仔從娼之案例，皆反映出推動廢婢運動的困難之處。此因許多被販賣或拐賣至新加坡的幼女，係由妓院老闆以妹仔或養女的名義收養，而不用向華民政務司註冊，且華民護衛官則僅有公娼妓院的登記名單，也無法得知妹仔淪為娼妓的確切人數，而無法判斷受虐幼女或少女的身分為妹仔或養女，更為審理虐待案件的棘手之處。再者，海峽殖民地政府與新客華人僑領對妹仔體制的看法分歧，更使新頒布的「婦女佣工法案」常無法發揮實際作用。在妹仔體制與賣淫業關聯的討論上，多數華人僑領認為華娼主要來源為出於自願或從中國遭到拐賣來到新加坡的婦女，購買妹仔並非妓院取得娼妓的正規管道。反之，他們認為妹仔體制的存在是良善的，華人家庭購買妹仔的主要目的為訓練她們做家務工作，並讓其免於遭到不法人士賣到妓院。⁵¹

然而，海峽殖民地政府於「婦女佣工法案」頒布前就對華人家庭蓄養妹仔的情況產生質疑，其中最大的爭論是妹仔身分是否為奴隸，若其身分為奴隸，依據「廢奴法案」的規定，華人使用妹仔就是違法行為。英國下議院於1922年也提出

⁴⁹ 〈已故閩籍建築包工蘇媽英之第三妾吳錦娘被控，迫良為娼，毆傷少女〉，《南洋商報》，1931年9月24日，版7。

⁵⁰ 〈逼良為娼之拐婆〉，《南洋商報》，1929年10月14日，版7；〈逼迫少女為娼案審判結果〉，《南洋商報》，1929年11月12日，版7。

⁵¹ The Mui Tsai System in Malaya,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323/1257/10.

同樣的質疑，認為妹仔體制為奴隸制度的存在。⁵² 因此要求新加坡政府必須更積極推動廢婢運動，遂有「婦女佣工法案」的通過。該法案因應遏止販運婦孺國際協會訂定的目標，致力於杜絕海峽殖民地販賣婦女活動。英國殖民部以維護人道為訴求，強調管制妹仔並非干涉華人社會的傳統風俗，而是要終結非法人口販賣貿易。然而，官方無法得知華人家庭購買妹仔的交易詳情，更難以證實妹仔的真實年齡，許多華人家庭就以此為理由，不付薪資給妹仔。⁵³

此外，華民政務司執行安置妹仔方案也不順利，此因該機構人力有限，無法在短時間內對數千名妹仔進行註冊登記手續，而收容機構的缺乏更是造成此項措施失利的主要因素。1920年代末期，保良局為唯一收容受虐婦孺的機構，該機構設置於1888年，由華民護衛司與華人僑領共同建立，係因應「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修訂條例而設置，主要經費來源來自政府補助與華人慈善家捐款。該局收容的女性類型主要分成三類：

第一類係為根據兒童條例者。此部分之人，皆為受人虐待之兒童。第二類係為根據家役條例者。此部分之人，皆為「妹仔」制度下遭害之人。第三類係為根據婦女保護條例者。此部分之人，皆為被人販賣者。⁵⁴

保良局教授她們手工藝，並讓其接受基礎教育，以具備基本獨立謀生的能力，或替其尋覓合適的婚配對象。多數受虐妹仔從主家救出後，就送到保良局安置。許多妹仔從主家救出時，身上有許多傷痕，且全身非常骯髒或衣服破舊。有些人則是進入新加坡時，遭到相關人員質疑其身分而送至保良局安置。送至保良局後，有些女孩被其家人帶回，或她們因與主家訂定契約而被帶回，少數女孩則拒絕回到主家而繼續留在保良局。當局依1930年頒布的「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對施虐的主家判刑，但僅有少數的主家被判處監禁，多數案件則以主家繳清罰金後結案。⁵⁵

⁵² 李雯，〈身似斷雲零落—20世紀初期新加坡的妹仔〉，《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1期，頁52。

⁵³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p. 199.

⁵⁴ 〈保良局女子之娛樂會·華民政務司有重要之演說〉，《新國民日報》，1931年9月28日，版6。

⁵⁵ Annual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Ordinance 172 (Female Domestic Servants), July 26th, 1931, The

然而，保良局自成立以來，就存在收容空間嚴重不足的問題，1925年的「婦女佣工法案」，及1925年與1927年的「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修訂法案相繼通過後，更讓保良局的收容人數激增。即使該機構於1928年遷移至新址約克丘（York Hill），最多也只能收容200至300人。⁵⁶ 根據曾為妹仔的林秋美所述，保良局內約有200至300人，主要為華人女孩，有少數的印度女孩，她們曾為妹仔、歌妓、孤兒或娼妓。⁵⁷ 該局分成兩棟，分別為宿舍、育嬰室，與遊戲間，但收容人數過多，生活條件並不好。而資金短缺也是該局經營不順的最大難題，因此常於華報刊登募款公告書，期望當地居民能基於人道考量踴躍捐款。⁵⁸ 由於保良局的物力與人力資源有限，因此無法提供更完善的課程及最佳的居住場所給其收容者。

基本上，海峽殖民地政府管制妹仔制度的立意是良善的，問題在歷年頒布的「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及「婦女佣工法案」都未觸及妹仔問題的核心點，即華人社群對此群體的看法，及其對廢婢運動的看法。「婦女佣工法案」的失敗主因為海峽殖民政府對妹仔體制不了解。此因多數受虐妹仔早與原生家庭失去聯繫，即使獲救也無法回到中國，最終仍是回到主家工作。但此時期英國殖民部仍未強制要求蓄養妹仔的家庭進行註冊登記，導致華民政務司官員無法持續追蹤受虐妹仔案件的後續發展。且官方採行不干涉華人事務的政策，對蓄養妹仔之主家採取容忍態度，只要他們未觸犯性騷擾等重大罪刑，都不會處以過重刑罰。此情況導致「婦女佣工法案」中的許多條文淪為紙上談兵，廢婢運動也難以有所進展。

肆、「妹仔法案」的頒布及其成效

1920年末，海峽殖民地政府積極推行廢除華人公娼制度，以遏止當地性病的蔓延，因為妹仔問題亦與賣淫業有所關聯，但無論是官方或華人社群對此議題的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273/573/1, pp. 1-2.

⁵⁶ 〈星州保良局常年參觀日大會紀〉，《新國民日報》，1931年10月26日，版6。

⁵⁷ Janet Lim, *Sold for Silver: An Autobiography of a Girl Sold into Slaver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Monsoon Books, 2004), p. 41.

⁵⁸ 相關報導有〈籌捐保良局基金通告〉，《新國民日報》，1926年1月6日，版6；〈保良局捐款委員會報告〉，《新國民日報》，1929年6月8日，版6。

討論都不多，直到「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修訂案⁵⁹於1930年實施，英國殖民部宣布所有妓院與妓女活動皆為非法後，才再度檢視廢婢運動失利的原因。從先前「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修訂條例與「婦女傭工法案」的相繼頒布，也反映出英國殖民部為了匡正社會道德風氣，及以維護人道之訴求為出發點，將廢除妹仔體制視為必須執行的政策。但廢婢運動的成功與否，仍取決於華人社群是否願意配合官方政策，共同來解決此社會問題：

儕婢女於畜牲道，不復以人視之女為榮耀，而不知其為附屬品，為寄生。今者人權漸張，階級制度，當然不能存在以厚民生。海外華僑，尤當革除此等惡習蓄養婢女，重行嚴加禁止，尚望同僑尊重，復破除不人道之惡習……。⁶⁰

由上述內容可知，海峽殖民地政府欲廢除妹仔體制的決心，但要在短時間內，改變多數華人社群對妹仔體制的看法，實為困難之事。因此官方先以緩進的方式，透過尋求華民護衛司、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立法委員會（Legislative Council）等官員們對妹仔問題的意見，並將「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修訂條例與「婦女傭工法案」轉載於華文報紙上，以取得華人僑領對蓄婢體制、修訂妹仔法令及妹仔薪資等議題的看法。

透過上述方式，海峽殖民地政府嘗試找出改善妹仔處境的方案，作為日後擬定「妹仔法案」的參考建議。從官方與華人僑領的討論中，可以歸納出二項對於妹仔體制的爭議，即婢女身分問題與擬訂妹仔薪資辦法。在妹仔身分問題上，先前的「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及其修訂法例皆未出現「妹仔」一詞，英國殖民部也未明文規定人們購買妹仔應遵循的法定流程。此因中國蓄婢之風盛行已久，無論是官家、商人或富裕人家都有購買婢女的習慣。妹仔與納妾制、童養媳，及養

⁵⁹ Straits Settlements No. 15 of 1930 An Ordinance to Amend and Consolidate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Girls and to Make Provis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Brothels,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 274/19, pp. 5-6.

⁶⁰ 俠，〈破除蓄婢惡習〉，《新國民日報》，1929年12月20日，版6。

女制有著密切關聯。⁶¹ 其中，妹仔與童養媳⁶² 的性質非常相似，最大的差別僅為後者成年後與主家兒子結婚。更有許多主家無力負擔納妾費用，直接娶其婢女為妾。在中國，許多人將其童養媳或養女轉賣至新加坡作為妹仔，以賺取更多的利潤。⁶³ 根據可兒弘明的論述，中國蓄婢制原意是良善的，目的之一即為遏止溺女風俗，才將幼女販賣至他家做妹仔，以改善其處境。但許多不法人士對外宣稱收養幼童為養女，實際上卻是以妹仔交易的方式購入孩童。甚者，人口販子名義上從事妹仔買賣，私下卻進行非法販賣婦孺活動，將女孩轉賣至海外地區。此情況導致妹仔體制成為拐賣人口貿易的溫床。⁶⁴

由於妹仔具備多重身分，海峽殖民地政府因此很難判定要以哪項法令來責罰犯罪的主家，最終僅能以受害者作為養女的身分來懲戒主家的行為。⁶⁵ 除了妹仔受虐案件頻繁發生，華民護衛司亦徵詢華人社群對給付妹仔薪資的看法。該機構曾召開華人參事局會議，對規範婢女每月工資的最低額度進行討論。陳嘉庚（Tan Kah Kee）認為所有妹仔都必須向政府註冊，若只規定給薪辦法，是無法有效地改善妹仔的處境。徐伯良醫生則認為妹仔註冊，及規定最低工資也都無法改變妹仔處境，唯有官方切實做好宣傳工作，讓華人社群了解頒布「妹仔法案」的意義，才能改變其對蓄婢體制的看法。⁶⁶ 且「妹仔法案」僅將妹仔劃分為三個年齡層，作為給薪的標準，但並未設想到妹仔若無法提出出生證明的配套措施，對改善她們處境並無實質上的幫助。

⁶¹ 廣東地區的自梳女也有蓄養妹仔或養女的行為，目的為防老。此外，該地區的有些不落家女子購買妹仔之原因為讓其做丈夫的妾，以代替自己來處理夫家事務。參見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301-302。

⁶² 中國蓄養童養媳者在下層家庭最為常見，其次是中層家庭，上層家庭則很少將女兒送至他家做童養媳，此現象與經濟因素有著密切關係，下層家庭常替2至3歲的幼子尋找親戚中年齡相近或剛出生的女嬰做童養媳，從而可以省下一大筆聘金費用。參見徐覺夫，〈客籍人之童養媳〉，《新國民日報》，1931年5月6日，版14。

⁶³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300-304。

⁶⁴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306。

⁶⁵ “Annual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Ordinance 172 (Female Domestic Servants)”, July 26th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273/573/1, pp.1-2; The Mui Tsai System in Malaya,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323/1257/10.

⁶⁶ 〈華民政務司署開華人參事局會議討論保護婢女問題〉，《南洋商報》，1930年1月21日，版6。

在收集各界對「妹仔法案」的意見後，海峽殖民地政府再度展開修訂管理妹仔的法案。鑒於妹仔受虐案件增加，擬訂新法令的目的就是讓這些不幸的女孩能立即至警察局報案，以保障其人身安全。新法令的提案內容強調婢女辦理註冊手續的重要性為：

一、使婢女之界說範圍放廣；二、獲得女子被售賣情形；三、證明婢女之年齡。⁶⁷

因此，新法令將英屬馬來亞妹仔的身分重新訂為「僕役」。1932年1月，海峽殖民地政府於馬六甲召開立法會議，對妹仔議案展開討論。在會議上，議員們決定先實施六個月的妹仔註冊手續，期限過後，尚未註冊之人將受到處罰。鑒於新加坡華人社會與香港不同，因此對雇主與婢女的身分予以定義。「雇主」為擁有監督、管理權及保護婢女職責者；「婢女」則是所有人或保護人在殖民地，或殖民地之外地區，以金錢購買，或因贈與、繼承、清理債務，以間接或直接方式向另一人取得者。同時規定女孩達18歲或結婚，就可以脫離婢女的身分。新法正式實施後，任何人都不能再攜帶婢女進入海峽殖民地。⁶⁸

1932年1月26日，立法委員會通過「妹仔法案」，「婦女傭工法案」則立即撤銷。新法的實施目標為移除英屬馬來亞以任何型態存在的奴隸制，並授予妹仔新的身分，及提供其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要內容如下：

自此律例施行後，無論何人不能再為婢女之監督，所有或監護者。……此律例施行之始，凡欲在本殖民地得一婢女受其監督，或保護者，應於律例施打六個月內，將上述之婢女向政府註冊。……僱主對於婢女不能加以虐待，並使婢女操勞過甚。凡為僱主者，對於婢女應給以不能過於政府最低之工資額。此外飲食當充足，衣食亦須合理，若遇婢女有疾病時，應延醫調治。⁶⁹

從新法案內容來看，官方將主家與妹仔的關係定義為雇主與僕役的關係。根據規

⁶⁷ 〈華民政務司取締妹仔新律令之提案內容（一）〉，《新國民日報》，1932年1月29日，版6。

⁶⁸ 〈海峽殖民地蓄婢制度廢止有期〉，《南洋商報》，1932年1月23日，版6。

⁶⁹ 〈海峽殖民地蓄婢制度廢止有期〉，《南洋商報》，1932年1月23日，版6。

定，原本蓄養妹仔的家庭要向地方官註冊，需要填寫妹仔姓名、年齡、出生地、出生日期、雇主與妹仔親屬的聯絡方式，及雇主購買妹仔的日期與僱用情形。

華人家庭進行妹仔註冊手續時，必須附上兩張妹仔照片及將其指模印在註冊簿上，以便日後考察。若是妹仔更換雇主、結婚、失蹤或死亡，雇主遷移至他地都必須向註冊官登記報備。⁷⁰ 此外，新法案對妹仔薪資的規定為，雇主每個月要給10歲以下的妹仔至少1元，10歲以上15歲以下者最少2元，15歲以上者最少3元。⁷¹ 若是沒有收到月薪，妹仔有權利離開其雇主。但許多妹仔也不知其實際年齡，因此，許多雇主填寫註冊單時常謊報其年齡，以減少薪資的開銷。

「妹仔法案」執行後，1933年6月英屬馬來亞地區總共有3,004名妹仔註冊登記，其中新加坡至同年9月有706名妹仔登記。⁷² 但此數據非常不準確，海峽殖民地政府官員認為很多雇主未帶妹仔前來註冊。儘管與「婦女傭工法案」相比，「妹仔法案」對於此群體定義更為廣泛，並要求提供擁有妹仔所有權的實體證據。海峽殖民地政府要求主家帶妹仔進行註冊登記時，應提供購買女孩的契約文書，及親友的聯絡方式。此舉是為了防範日後妹仔遭遇主家虐待，或非法轉賣至別處遭到查獲時，能以這些文件作為證據來指控主家。華民政務司也能透過妹仔提供的親友聯絡資料，為其規劃更為妥善的安置計畫。⁷³ 此外，華民政務司指派女稽查員負責稽查未註冊登記的婢女，若是發現華人家庭未替妹仔註冊，則處其罰款或監禁，若是通報有妹仔受虐事件發生，女稽查員亦有隨時進入華人家庭查明情況的權力，若是查獲屬實或發現妹仔尚未註冊，則可以將雇主及婢女帶回華民護衛司。⁷⁴

再者，英國殖民部認為「妹仔法案」的通過將大幅改善英屬馬來亞的妹仔處

⁷⁰ 〈將來僱用婢女各項註冊手續，已由總督制定，但需立法會議通過〉，《南洋商報》，1932年12月3日，版6。

⁷¹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p. 199.

⁷²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pp. 220-221.

⁷³ The Mui Tsai System in Malaya,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323/1257/10.

⁷⁴ 〈婢女登記期滿後，護署已任訂女稽查員專事稽查未登記之婢女〉，《星洲日報》，新加坡，1933年6月25日，第二張，版7。

境，從而遏止非法婦孺買賣活動。代理華民政務司輔政司佐頓氏（A. B. Jordan）認為新法案之頒布目的為：

以為海峽殖民地內有奴隸制度存在，並用特別之條文，宣佈本法律已在全英帝國通行。即係不能以女子作為產業看待，並從事用法律之手續，以保護「妹仔」狀態之女子也。⁷⁵

該議案之目的，在取締奴隸或半奴隸制度。是種制度之存在，與本殖民地以擾害，使是有類婢子之女子實行註冊手續，以為保障。⁷⁶

從上述言論能了解英國殖民部亟欲廢除妹仔體制，並將妹仔身分合法化。同時，海峽殖民地政府官員加強對入境新加坡女性的盤查，並讓其了解日後遭遇困難時，可以向華民護衛司求救。實際上，許多女孩入境時是喬裝成人口販子的親戚或養女，之後才轉賣至主家從事妹仔的工作，因此並未前往華民政務司註冊登記。而且許多妹仔順利通關後就立即被送往主家，與外界隔離起來，因此也無法得知有「婦女佣工法案」與「妹仔法案」的存在。以妹仔林秋美為例，她被香港的主家以250銀元轉賣至新加坡，新的男雇主為年老的男人，常對她性騷擾，甚至多次暗示其成年後就娶她為妾。「妹仔法案」頒布後，林秋美並不知道此訊息，後來雇主帶她去註冊登記，負責人員才告知她若受到虐待能向其通報。之後，家中的另一名妹仔逃跑，政府的稽查員來到主家，讓林秋美陳述主人罪行，再將她們送至保良局安置。她獲得主家700元的賠償金，因而能夠去教會學校念書，之後成為護士。⁷⁷ 然而，林秋美這類的案件非常少，因為多數妹仔受虐案件並未被舉報，甚至有許多妹仔被轉賣至妓院或其他地區，而無法掌握其行蹤。

實際上，許多妹仔未曾聽過「妹仔法案」，直到主家帶其去註冊，才得知廢婢運動的動態。鑒於此情況，英國殖民部於1936年組織妹仔委員會，對香港與英屬馬來亞的妹仔體制進行調查。⁷⁸ 1936年6月11日至18日，妹仔委員會造訪新

⁷⁵ 〈婢女法制案〉，《新國民日報》，1932年1月27日，版6。

⁷⁶ 〈華民政務司取締妹仔新律令之提案內容（一）〉，《新國民日報》，1932年1月29日，版6。

⁷⁷ Janet Lim, *Sold for Silver: An Autobiography of a Girl Sold into Slavery in Southeast Asia*, pp. 38-40.

⁷⁸ The Report on Mui Tsai: Two Pictures Given by Commission, *Times*, 1 March, The National

加坡，考察當地蓄養婢女習俗之緣由、婢女生活情況，保良局及其相關機構之運作，並將此消息刊載於各大華報。⁷⁹ 結束調查工作後，該委員會將所得訊息進行彙整，並刊載於華報，以徵求華人社群對婢女問題的看法。⁸⁰

根據妹仔委員會的報告，新加坡廢婢運動失利主因在海峽殖民地政府的官員無法識別妹仔的真實身分。由於英國與新加坡社會皆盛行認養孩童之風，英國殖民部對中國習俗與蓄養妹仔制間的關聯並不了解，因此難以辨識妹仔、養女、童養媳及女僕的不同，導致許多妹仔受虐案件未能被查獲。⁸¹ 因此，立法委員會於1932年召開會議討論蓄婢制度下的「妹仔法案」議題。在會議上，無論是新客華人或海峽華人皆持妹仔體制應該廢除的看法，但幾位委員認為法案中對婢女身分所訂界限太過廣泛。蔡克諧認為「妹仔法案」中，「凡非家庭中家長所生之女兒養女、繼女及童養媳均須以婢女名義註冊」的條例，對婢女的解釋過於模糊。法案中也未提及華人家庭有收養養女的習慣，且未說明家中有養女者，若未註冊登記是否亦為違法之舉。⁸² 由此來看，英國官方似乎不認為華人社群有領養幼女之風俗，且不清楚養女與童養媳的區別，若是新法案仍未將婢女、養女與童養媳的差異做明確說明，則妹仔問題仍無法解決。

新加坡首位華人女律師張舜琴認為新法案授予華民護衛司的權力過大，應加以限制，並提議要將婢女名稱做詳細說明。此因若有女孩與養父母相處不融洽，就直接向華民護衛司指控遭到虐待。若華民護衛司未查明其真實身分，將女孩視為妹仔來處罰養父母的行為，則有可能會造成家庭失和的情況發生。⁸³ 海峽土生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825/22/11.

⁷⁹ 〈調查婢女委員會行將過星，歡迎各界發表意見〉，《星洲日報》，1936年4月30日，第二張，版7；〈香港馬來亞婢女問題，英理藩部組織調查委員會，華民政務司署協助進行，發通告書徵求吾僑各界人士意見〉，《總匯新報》，新加坡，1936年5月2日，第二張，版3。

⁸⁰ 〈婢女調查委員會，備具條文徵求答覆，共分五大項計有細則三十一條，著重婢女與家庭關係及自立問題〉，《星洲日報》，1936年6月18日，第二張，版6。

⁸¹ Rachel Leow, “‘Do you Own Non-Chinese Mui tsai?’ Re-examining Race and Female Servitude in Malaya and Hong Kong, 1919-1939”, *Modern Asian Studies*, 46:6, p. 1744.

⁸² 〈婢女條例為保護婢女良法，惟養女與婢女無何區別，或將發生種種不幸結果〉，《南洋商報》，1932年3月14日，版6。

⁸³ 〈婢女條例為保護婢女良法，惟養女與婢女無何區別，或將發生種種不幸結果〉，《南洋

華僑公會（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會長林漢河（Dr. Lim Han Hoe）則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海峽華人蓄養婢女者較少，且妹仔體制為華人積習，不應繼續存在於當代社會。此外，英國殖民地部積極釐清蓄婢制與養女制的區別，並非沒有任何作為。為了避免日後有人濫用「妹仔法案」，取締非法蓄婢案件應該全交由華民護衛司執行，以免工作分配不清楚，遭人控訴政府官員從事私闖民宅的非法活動。⁸⁴

除了對華民護衛司授權問題的意見仍有紛歧外，華人僑領對「妹仔法案」應將妹仔的界定範圍放大，及懲罰蓄養妹仔主家都達成共識。前者為因應新加坡華人社會分成海峽華人與新客華人兩大社群，其中新客華人又由廣東、福建、海南、潮州、客家等族群組成，各有其風俗習慣，對妹仔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新法案中，需要將妹仔的界定範圍放大，以適用於各華人社群。⁸⁵ 在違法主家之處罰上，有些委員認為若是被告為初犯，則不應判重刑，此因多數蓄養妹仔家庭為中下層階級，其經濟條件並不優渥，因此提議懲罰不應過重。⁸⁶

除尋求華人社群對「妹仔法案」的看法之外，妹仔委員會也檢視此次法案成效未達預期的原因。首先，海峽殖民地政府擬訂管理妹仔辦法係以英國「僕役法」與「勞工法」作為參考依據，認為只要廢除妹仔體制，並改善妹仔的工作待遇，就能有效地解決此社會問題。然而，19世紀中後期的英國與此時期的新加坡，無論在社會與經濟環境或族群組成都不相同，若是以當時英國的情況作為訂法標準，則勢必無法適用於1920年代的新加坡華人社會。甚者，新加坡於1930年廢除公娼制度後，許多從良娼妓因身分問題及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表面上在咖啡店從事女招待的工作，私下卻非法賣淫。其中有些女招待原本為妹仔，先前被主家轉賣或遭人口販子拐賣到妓院，當她們非法賣淫遭查獲時，華民護衛司官員才得知其先前的遭遇，但已很難查出先前違法的主家或人口販子的去

商報》，1932年3月14日，版6。

⁸⁴ 〈婢女法規華人多表贊同·唯一難決之點·養女與養婢將如何區別〉，《南洋商報》，1932年1月25日，版6。

⁸⁵ 〈華民政務司取締妹仔新律令之提案內容（二）〉，《新國民日報》，1932年1月30日，版7。

⁸⁶ 〈婢女法規華人多表贊同·唯一難決之點·養女與養婢將如何區別〉，《南洋商報》，1932年1月25日，版6。

向。⁸⁷

再者，妹仔委員會在報告書中將香港與英屬馬來亞的廢婢運動進行比較，希望找出後者實施成效不佳的原因。先前擬訂「妹仔法案」時，英國殖民部曾提及要以香港廢婢運動作為參考指標，來解決新加坡的妹仔問題。⁸⁸但實際上，香港的妹仔體制與英屬馬來亞的妹仔體制看似相同，但仍有許多不同之處，如英屬馬來亞距離中國較遠，許多妹仔與原生家庭已經失聯，要調查其家庭背景有其困難。此因根據「妹仔法案」規定，妹仔有權利要求恢復原生家庭對其監控權，且不用歸還主家簽約時所付的費用，但法令並未說明如何查證原生家庭成員是否在世的方式。從香港管理妹仔的方式來看，官方會指派監察人員定期監視妹仔的情況，但新加坡華民護衛司並未嚴格執行此項措施。

在管理妹仔辦法上，新加坡的管理機制也不如香港健全。〈華民政務司取締妹仔新律令之提案內容（二）〉一文指出，規範華人家庭所認養的女孩，無論是婢女或養女，都由「妹仔法案」管制，這是與香港差異最大之處。此情況應與香港華人社群主要為廣東人，對妹仔問題的解決方案較容易取得共識，且較能配合當地政府的政策，來處理非法販運婦孺的事務。⁸⁹新加坡華人社群則組成較為複雜，且風俗各異，對妹仔體制的看法因此較為分歧。此外，新加坡廢婢運動並未使華人社群分成兩派陣營：支持廢婢制與反對廢婢制，並對此議題展開熱烈的討論。香港則於1921年由定例局的華人議員劉鑄伯與何澤生發起首次討論婢女制的大會。在大會上，出於各自利益與立場的不同，分成兩派意見：主張廢婢者認為應解放婢女，反對廢婢者則認為婢女與奴隸不同，且多數人在主家的生活條件較好，應維持現狀。⁹⁰大會結束後，反蓄婢陣營取得較多支持，進而促使「婦女家政服務法令」於1923年通過。

⁸⁷ 葉紹純，〈星洲當局之廢娼與取締女招待問題〉，《南洋情報》，第2卷第6期（1932年10月），頁386-387。

⁸⁸ 〈華民政務司取締妹仔新律令之提案內容（二）〉，《新國民日報》，1932年1月30日，版7。

⁸⁹ 〈華民政務司取締妹仔新律令之提案內容（二）〉，《新國民日報》，1932年1月30日，版7。

⁹⁰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頁307-308。

由此來看，新加坡的廢婢運動主要是由英國政府所主導，與國際上的廢除婦孺買賣運動相互呼應。因此，廢除妹仔體制的呼聲最初出現時，並未廣泛地引起華人社會的注意。此從華文報紙所刊載的妹仔報導可以看出，「婦女傭工法案」頒布前，相關文章以中國廢婢運動為主，當地的妹仔受虐案件也很少引起華人僑領的關心。此情況要到「婦女傭工法案」頒布後才有所改善，海峽殖民地政府也開始以華文報紙作為向華人社群傳遞廢婢運動訊息的平台，出現如法令、販賣婦孺買賣、南洋地區的妹仔活動等報導，而華人僑領也開始對妹仔問題予以關注，對廢婢法令的內容進行討論。

伍、結論

綜合所述，「婦女傭工法案」頒布前，英國殖民部雖將販賣婦孺視為非法活動，但仍允許華人家庭蓄養妹仔，未進行取締。然而，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妹仔是否為奴隸的身分已產生質疑，惟仍未提出具體的廢婢政策。至1920年代中期，因新加坡性病蔓延問題日趨嚴重，英國殖民部乃積極透過組織社會衛生學諮詢委員會，與頒布「婦女和少女保護條例」來管制華人妓院活動，並加強遏止非法婦孺買賣的進行，以減少娼妓來源。同時，英國殖民部頒布「婦女傭工法案」來管理妹仔群體，以避免她們被轉賣至妓院，或轉賣至其他地區。但英國官方尚未對妹仔進行註冊登記，因此執行成效不佳。「妹仔法案」係依據「婦女傭工法案」進行修訂，但仍未對妹仔與養女的身分做更明確的定義，且英國政府對於華人蓄養妹仔的根源與風俗不夠了解，致使妹仔註冊登記的執行亦未如預期順利。

在此時期，從新加坡華文報紙刊登妹仔報導或文章的數量變化，反映出廢婢運動漸為華人社群所重視。以「婦女傭工法案」作為分水嶺，前期的新聞報導以中國與香港兩地的廢婢新聞為主，刊載的文章或新聞報導多轉載自中國報紙，較少對新加坡的妹仔處境予以重視；後期華人社群則開始對海峽殖民地政府的廢婢法令做出回應與討論。從華人僑領對「婦女傭工法案」與「妹仔法案」的討論可以得知廢婢運動失利的主因，即華人社群與英國殖民部對妹仔身分的定義有所不同。前者認為妹仔、養女與童養媳應做明確定義，以作為審理虐待妹仔案件的判

斷標準；後者則認為妹仔身分合法化為廢婢運動的主要目標，並不需要對妹仔身分進行釐清。此現象反映出東西方對妹仔體制的不同看法。由於雙方在廢婢政策上未取得共識，英國殖民部遂於1939年頒布「孩童法」修訂法案，規定14歲以下的孩童未與親生父母居住者都被視為被轉讓孩童，必須向政府註冊登記，以保障其權益。新加坡淪陷前，當地妹仔亦受此項法令保護，但要到二戰結束後，英國殖民部才對妹仔政策重新進行規劃。

徵引書目

一、檔案文件

Sir Wilfrid Woods and Edith Picton Turbervill,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Report of Commission*,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37.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273/573/1.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274/18, 274/19.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Mui Tsai System in Malaya, U.K., Colonial Office, CO 323/1257/1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825/22/11.

二、史料彙編

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黃月波、于能模、鮑釐人編，《中外條約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

三、報紙、雜誌

《叻報》，新加坡，1890、1893、1900、1925年。

《新國民日報》，新加坡，1922、1926-1927、1929、1931-1932年。

《南洋商報》，新加坡，1924-1926、1928-1932年。

《總匯新報》，新加坡，1936年。

《星洲日報》，新加坡，1933、1936年。

四、專書

王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新加坡：新加坡新社，1987年。

- 吳慶棠，《新加坡華文報業與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
- 邱新民，《新加坡先驅人物》。新加坡：勝友書局，1991年。
- 彭偉步，《《星洲日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傳播系，1996年。
-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 Grant, Kevin, Philippa Levine, and Frank Trentmann, eds. *Beyond Sovereignty: Britain, Empire and Transnationalism, c. 1880-19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Lai, Ah Eng. *Peasants, Proletarians and Prostitut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ork of Chinese Women in Colonial Malay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 Leow, Rachel. *Contexts of Abolition: the Mui Tsai Controversy in British Malaya, 1878-1938*.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 Lim, Janet. *Sold for Silver: An Autobiography of a Girl Sold into Slaver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Monsoon Books, 2004.
- Limoncelli, Stephanie A.. *The Politics of Trafficking: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 Combat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Wom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五、論文

- 李元瑾，〈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意識的轉變〉，收入李元瑾主編，《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2年。
- 李雯，〈身似斷雲零落—20世紀初期新加坡的妹仔〉，《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1期（2011年3月）。
- 葉紹純，〈星洲當局之廢娼與取締女招待問題〉，《南洋情報》，第2卷第6期（1932年10月）。
- Gorman, Daniel. “Empire,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1920s.”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9:2 (2008).
- Leow, Rachel. “‘Do you Own Non-Chinese Mui tsai?’ Reexamining Race and Female Servitude in Malaya and Hong Kong, 1919-1939.” *Modern Asian*

- Studies*, 46:6 (November 2012).
- Lowrie, Claire. "Masters and Coloniser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Domestic Mastery, 1920s-1930s." in Claire Lowrie, *Masters and Servants: Cultures of Empire in the Trop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 Lowrie, Claire. "Sold and Stolen: Domestic 'Slaves' and the Rhetoric of 'Protection' in Darwin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in A. Vickers & M. Hanlon eds., *Asia Reconstructed: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AA*. Canberr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6.
- Todd, Selina. "Domestic Servi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Britain 1900-1950." *Past & Present*, 203 (May 2009).
- Yoong, No Siew.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Singapore, 1877-190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 (March 1961).
- Yuen, Karen. "Theorizing the Chinese: The Mui Tsai Controversy and Constructions of Transitional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and British Malaya."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December 2004).

